

西迁纪事:

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一次浴火重生，中国大学于此危难之际，颠沛流离，经受了从精神到建制的本土化洗礼。在烽火连天的岁月，北师大辗转陕甘僻地，履行抗战救国、服务西北的使命。9年弦歌不辍，在保持学脉延续的同时，实现了“宏我教化”“倡我民治”的师道承传，始自京师大学堂时期的“树风声”“为表率”的办学精神也得到了淬砺。今年是北师大西迁回归复校70周年，校史研究室将推出系列文章，来追忆西迁陕甘时期的难忘岁月，并以此向即将在我校举办的“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论坛”献礼。

纪事一：卢沟炮火与师道西行

“煌煌黄舍”与“万里转徙”是两个很难联系在一起的视觉意象。一个给人的感觉是“高雅肃穆、名高声远”的雍容，有历史的深厚和气象的阔大；一个展现的是“高歌逆天风，壮志方慷慨”的豪情，有路途坎坷的艰辛和不吝热血的坚韧。然而，卢沟桥的炮火与全面抗战的号角，很快把这两者进行了缠结。由此，一个大学的存亡绝续与抗战的长期与残酷联系在了一起。

历史是不能假设的，我们先以白描的手法，将时光定格到抗战前，讲述北平师范大学1936年的风貌。

一、巍巍学府：1936年间的回顾

由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开源，历经京师优级师范学堂、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发展而来的北平师范大学，经过30多年的发展，已成为一所包含三学院10学系、一个研究所（1933年改研究院为研究所）的高水平大学。她还下设附属幼稚园、2所附属小学、附属中学（分南校、北校）、乡村教育实验区和平民学校，是民国时期的学术重镇、教育改革的前沿阵地和教育人才的培养中心。



校门

先看办学规模。截止1936年，北平师范大学在校生944人；教职员233人，其中教员151人。两所附属小学在学人数1600多人，附属中学在

学人数1000余人。同志们会说，大学本部学生规模才千人，恐怕还比不上现在的一个学院吧。纵向的对比没有意义，我们做几项横向的对比。首先是与国家高等教育的大盘子比，1936年全国计有专科以上学校108所，高等教育各科学生数共计41611人。校均规模不足400人，1000人的规模是较大的了。就当时的全国学术文化中心北平来说，国立大学仅有四所，其他三所分别是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和北平大学。就学术地位来说，作为全国硕果仅存的师范大学，北平师大有着鲜明的办学特色、完备的附属学校系统和教育实验基地，这使其在高深教育学术研究、教育改革实验以及国语研究和推广方面成为旗帜。北平师范大学的生源情况也不错，1936年报考3619人，实际录取190人。

再谈学校的基本建设。北平师范大学本部有两个校区，分别位于和平门的厂甸（和平门外南新华街）和石附马大街（新文化街东段路北），图书馆和丁字楼是当时的标志性建筑，风雨操场也很有名。藏书达11万多册，在当时的高校中是很宏富的。学校还建设有物理系电瓶室、化学系实验室、生物系的温室，并配置有无线电的放送设备。“校友楼和大礼堂的建设也在筹划之中。”



图书馆



丁字楼

如果不是这场战争，按照正常的发展轨迹，北平师范大学应该能够依照国际上的通行标准和发展趋势，在国内一流的建设成就之上，不断提高综合实力和办学水平的。卢沟桥事变的发生，终止了这一可能。

二、走留之间：炎热酷暑中的彷徨

日本的侵华是蓄谋已久的。窃取东北只是开端，危害华北是步步进逼，卢沟桥的炮火则是公然的挑衅。1937年7月17日，蒋介石的庐山讲话，“希望和平，但不求苟安，准备应战，而决不求战”，最能代表国民政府的抗战态度。7月29日，二十九军撤退。8月8日，日军入城驻兵，北平完全陷落。全面抗战大幕开启。

日军的疯狂罄竹难书。按照国际惯例，“在可能范围内恢复和确保公共秩序和安全”是占领方的责任。对教育、文化机构的自觉保护，对平民生命安全的保障也是其基本的道义责任。日军的举动匪夷所思，文化教育机构反而是破坏的重点。7月，日本飞机轰炸天津，将南开大学夷为平地；8月，日本轰炸南京，选择了中央大学等非军事目标；北平师大的师生能经常听到，“侵华的飞机从北师大图书馆房顶上低空掠过时的轰鸣声”。北平陷落后，北平师大教育学院很快被日军南城警备司令部占据，文学院被日军空军山之内航空部队占据，“教职员学生校工纷纷逃避，校工有在校门外观望者，竟至触怒寇军，立加逮捕绑缚，欲予枪毙，几经交涉，始得释放。对于校中什物任意破坏，或生火为炊，或遗弃满地，并运走物理系无线电机，学生私人书籍行李之存置学校库房者，亦横遭抢劫盗卖。恐慌情绪很快在战区蔓延开来，或许，这就是日军想要的。

时值暑期，北平师大的不少师生已离开北平，留驻的多为教职员工。他们的心

情至为复杂，在历史的大转折关头做出了不同的抉择。

西迁前的北平师范大学是学生运动的中心，在历次“反日爱国”活动中冲在前面，未来的下场是不敢想的。作为一校之长的李蒸，8月7日自北平脱险至天津，经青岛、济南，9月初到南京，向教育部接洽西迁事宜，随后去了西安。一些教师放下教职，置身抗日救亡的前线。张郁光在聊城保卫战中英勇殉国。杨秀峰做抗战干部的培训工作，担任了河北抗战学院的院长。有的另谋生路，如常道直先生，去了安徽大学。也有变节的，如王谟，心甘情愿地做了“伪北京师范大学”的院长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北平师大的专任教职员工中，过半随校西迁，兼职教师则大多流失。



钱玄同

钱玄同先生因身体原因，滞留北平，但始终保持着高洁的节操。他虽和钱稻孙有叔侄之亲，和周作人等有友好之谊，但“不受包围，不被污辱”。1938年春，他恢复了旧名“钱夏”，表示“夏”而非“夷”，不做敌伪的顺民。他寄语西迁的黎锦熙等先生，说“绝不污伪命”。1939年，钱玄同去世，许寿裳先生的挽联，“滞北最伤心，倭难竟成千古恨；游东犹在目，章门同学几人存。”也许很能代表这种面对人生抉择，转眼生死离别，同事之间，朋友之间，感时伤事、情牵志勉的哀婉与悲叹吧。

三、西行路上：辗转避难时的风险

1937年9月，国民政府电令：“以北平大学、北平师大、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，设立西安临时大学。”师大师生陆续奔赴西安，但通向西安的道路行进艰难，多有险阻，大家的命运甚至生命面临着难以预料的风险。

从平津出发，“由于华北陆路交通被日寇封锁断绝，他们不得不先向南、再向西向北绕道而行：冒着被日军搜捕的危险，先进入天津英、法租界，然后搭乘英国客轮经大沽入渤海，由山东的龙口或青岛上岸，绕一个大湾，再奔赴西安。”

对此，周裕农校友有一段细节性的回忆，“客车从北平开出，过丰台后，就站站让日本军车……即使车停站上，谁也不敢下去，因站上堆满日军军火物资，

并有荷枪实弹的日军站岗……行车近十五小时，始到天津站……出站口两边布满了日本军人，挨个检查，对剃了光头的北平学生就拉到一边，不让出站，以后就没听见下闻了！……等待过万国桥露宿的旅客，密密麻麻摆得好长好长。这一晚上，日本军警轮番挨个以手电筒照射面孔全身，检查旅客，日本军警一来，露宿的旅客无不提心吊胆，也有被检查时带走的”。没有“下闻”“带走”，意味着被消失了。只有进入外国租界才暂时安全，“八月二十日乘小汽船到塘沽渤海边，改坐‘九江’号海轮，十四日清晨‘九江’号行在渤海中，船上喇叭播出了上海爆发‘八一三’抗战的消息，轮船不能停靠上海港口，去上海的旅客可改在青岛或广州上岸。……海轮到青岛，日寇已在轰炸青岛，并要进攻青岛了。……我很幸运地搭上最后一列内撤的火车到了济南，然后经武汉转火车到长沙，回原籍家乡了。在家乡得到师大已迁西安的消息，赶快辗转奔到西安。”

这是一段较完整的迁徙记录。虽说不上九死一生，但处处凶险。西安临时大学成立，师大师生皆自行前往。赵慈庚有一段回忆，“我断定北平一时不能收复，自己不能留在这里当亡国奴，便在八月下旬，绕道回家，又于九月下旬弃家经太原转西安。10月4日下了火车，才知这里正在筹办西安临时大学，我原是北平师大附中教员，便停下来参与附中西迁的准备工作。”

抗日战争的爆发，改变了很多学子的人生轨迹。北平师大的近千名同学中，1937年毕业227人，他们中不少同学投身抗日救亡的工作，如郭庆云、程绯英、曹国智等。未毕业的700余名同学中，有一些去了延安，有一些走上抗战前线，或直接为抗战服务，如杜润生、敖白枫、陈泽云、刘御等。少数转入其他大学就学。部分同学或失学或失联。过半数的同学最后辗转到了西安。



校歌

正如20年代由老校长范源廉作词的师大校歌所唱的，“往者文化世所崇，将来事业更无穷，开来继往师道贯其中。师道师道谁与立，责无旁贷在藐躬。皇皇兮首都，巍巍兮学府，一堂相聚志相同，朝研夕讨乐融融。宏我教化，昌我民治，共矢此愿务成功。”

不过，“首都”变成了“故都”，但师大师生“师道担当”的责任未变。在抗日救亡的洪流中，“宏我教化，昌我民治”，仍是师大人的志愿。战争虽然损坏了物质，隔断了故园，但精神并未因此而疲弱。西

行漫漫，环境的艰苦超出了想象，但师大人的精神未垮，它不仅在颠沛流离中远播，也在西行中得到了培植和升华。此是后话，留待以后叙述。（魏书亮 白 媛）